

信息社會，多種文化素養及 公民教育：教育的嶄新邊界

羅世賢*

儘管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已經存在一個有目共睹、活生生的現實，卻有許多人仍未意識到全球社會正處於人類歷史上最深刻的技術革命的這個事實之中。這場革命很有可能將改變人類社會生活所有方面的生存方式，無論是我們的工作方式，我們的通訊方式，還是我們的娛樂方式。

這場以計算機、通訊、信息及多媒體技術為中心的技術革命是當代社會的新面貌，已約定俗成地被稱為知識與信息社會。這樣，教育行為在這場將影響到我們日常生活上上下下所有方面的革命起到核心作用。

的確，這場偉大的變革為所有制定教育政策的負責人，及所有教師和教育者提出了無數的挑戰。這些挑戰包括對為教育行為開闢新的教育計劃和創新途徑的教育理論反省再思，以創造性和有效的方式充分利用通訊手段及考慮教育行為重組的模式，以便它能夠在不同程度上，創造性和逐漸地適應我們大家都面臨的技術與社會變化。

但這場技術革命也可有另外一個值得強調的重大影響。在使用相對少，且成本越來越低的技術時，可以通過網絡將全球各地聯絡起來，使不同文化，不同社會階級，不同種族及不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人參與對一個越加複雜的世界的變革，也可通過對新知識的方便獲取，使他們意識到積極參與一個更加民主與多元文化全球社會建設的必要性。

關於數字時代的這番話令人有些樂觀，似乎預示著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儘管它矛盾地來自以財產的不平均分配而造成的相當大的社會不公正程度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政權採用了新的先進的控制方法。

* 東方基金會中國澳門代表處主任

重要的是不可忘記，信息社會如同其他事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階段之一。這場第三次技術革命不僅使它保持，而且提高它的經濟權力，因而提高它的政治，社會和文化影響。這便是社會語言學家哈咯咯（Claude Hagège）所稱的世界的麥當奴化或麥當奴世界。

信息社會尚未達到其鼎盛，但在近幾年內將會發生。因此，肯定會深化三個基本的發展條件：

- 通訊技術更加強大，也就是說，比目前更加先進。這在未來幾年後是完全可能的；
- 一場重大的經濟投資將建立數字經濟的網絡（銀行業及通訊企業在此方面的大量賭注絕非偶然）；
- 最後，相當一批具有知識及培訓的公民可以消費/購買通訊技術所提供的產品（數字電視，多媒體，英特網等等），而他們本身又是這些產業的從業者。一個文化或技術知識低下的人口不會創造維持信息社會的購買者或從業者。

因此，數字時代的資本主義社會需要新的文化形式上的掃盲人。需要形成新的文化素養，以適應一個新興社會的需要。

這裡似乎有兩種衝突的傾向或教育論點：

- 一方面，是來自全球經濟高度發展的國家或經濟區的社會，即信息或數字時代社會的論點。他們企圖衝破傳統的教學模式，理由是教學應向信息及通訊技術開門，完全重組教育概念及組織，使教育過程更加變通，打破將教育視為在某個稱為教室的具體空間內傳播知識的傳統視野。

這一趨向的激進方式要求目前的教育中心讓位於虛擬教育中心。如此一來，任何一個學生可以在他的計算機前聆聽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進行的課程並可以在課時內與在線的其他同學通過遠距離通訊技術討論課的問題。整個教學活動將由一個教員或電子輔導員安排和監控；

- 另一方面，是對人文主義或保持現代社會的理性思維傳統的呼籲。它認為，學校應該是培養公民教育的地方，向新的一代傳授知識與文化，應成為普及知識和發展對現時進行批判與反思思維的最佳空間。

這一呼籲還認為，學校應該改變，但應恢復人文與思想自由文化的價值，使此種文化按照邏輯適合一個為科技知識統治的世界。這一傾向的激進觀點使它認為，真正的文化在於印刷的文化素養（書籍，雜誌等等），而視聽手段及數字技術僅僅應該成為休閒資訊市場的工具。

排除兩種論點的極端看法，二者也有理性的部分。通過兩種傾向某些原則的交融與結合，可以建立一個 21 世紀教育應該做到的最基本的論點。

的確，批評技術的理論，既應該避免恐懼技術症，又應該避免技術狂。否認技術的決定性是對限制、失衡及新通訊手段及技術陰暗面的批評，但要利用和重建這些工具，以服務於教育，爭取民主和社會重建，推行社會正義。

如同哈佛大學教育學院一位女教師所言，技術與教育最難克服的困難在於有許多人首先考慮到的是技術，然後纔是教育。

在當代社會，信息的新技術已是大勢所趨，因此問題已不是諸如計算機引入教室好壞與否的問題。我們知道，它不是教室中最重要的成分。問題是知道如何使用它：用計算機可以達到甚麼最佳教育目的；師生需要甚麼能力來了解和發展新技術方面的知識；它對教育會產生甚麼效果；我們需要甚麼新的文化素養、教育前瞻及社會關係來普及和優化教育。

的確，在無技術政策和不對師生進行合適的理論與實踐培訓的情況下，在學校中引入新技術實屬怪事，不倫不類。

且不論對在學校中使用新技術重要性的不同說法，管理者、教育者、政治家及父母的共同看法是，目前的教育大綱及教學方式未能培養學生可以迎接 21 世紀挑戰的必要能力。因此，必須進行必要的調整與變更，以便確保學校成為一個數字教育的環境。

例如，在美國，95% 的學校和 72% 的教室與英特網接通。然而，86% 的教師利用英特網通過電郵進行教學和尋找教材，卻只有 66% 的教師利用英特網來優化教室內的教學。補充說，只有 30% 的教師方便並幫助學生利用英特網來做調查，27% 的教師用它來解決問題，最後，只有 16% 這個很小的教師組用這些工具來組織課程。（企業總裁科技教育論壇，2000 年）

這表明，即便在信息社會中，仍然繼續強調硬件、連通性和新技術的基本操作。另一方面，這說明學校及師生尚未充分意識到數字教學的巨大潛能。

數字教學是一種組合了技術、連通性、內容和人的教育方式。正確使用它，可以令學生以創造性、合作與投入的方式尋找和處理信息，尤其是共享一個隨時可用的廣闊的資訊、思維、資源及專家的儲存庫。

數字內容並不局限於一台計算機。包括可視資料、軟件、唯讀式光碟、網頁、電郵、在綫教育管理系統、計算機模擬、聯網討論、資料檔、資料與聽力資料庫。在數字教學中，數字內容從不可缺，因為它：重要，更新與真實；可得到不同層次的開發；可操作；即時；具有創造性。

在此種教育方式中，也有其他虛擬形式。過了一段時間，學生們會為自己創作內容。學生們成為了作家、製片人、出版者、主編和圖文設計者。使用計算機、數碼相機、可視資料、音響設備和軟件，他們可以創作很有創造性的視聽和多媒體的故事。

這樣，師生將有新的作用，尤其是教員每天將承擔作為計劃者，輔導員及信息技術調研者的複雜作用。教員必須：

- 選擇與使用教學內容（多媒體短片、博物館藏品、數據庫、參考資料等等）；
- 準備材料（單元或課程、計劃、輔導、活動等等）；
- 學生的作業（藝術、音樂、話劇、桌面電影等等）；
- 特殊活動（比賽、遊戲、主題討論、獎勵等等）。

也由老師介紹工具：

- 文字處理軟件；
- 試算表；
- 卡片製作系統；
- 佈圖設計；
- 搜尋器；
- 全球資訊系統等等。

以及其他可利用的通訊手段：電郵、交談室、電子告示板、雙向視像會議、同步討論、萬維網廣播等等。

如今，全世界的科學界可以在同步時間內對話。如今，一個學醫學的學生可以通過數字模擬器學習解剖學，兩個相同專業領域的醫生可以通過網絡交換準確的有關信息，以便對某個病人進行最合適的臨床診斷。

或許這便是目前的教育論點所捍衛的根據信息社會的挑戰來調整教育制度的必要性，以求發展包括綜合了印刷品、對話、視覺及聽覺的多種不可或缺的文化素養。這一綜合性包括了各種通訊手段的融合與互動，將其變為一種積極的過程。它具有意義，因而需要新的能力。例如，與一個網頁或唯讀式光碟互動常常需要掃描一篇文字、閱讀圖表、觀看圖像、耳聽聲音、欣賞動畫等等。這要求使用者要經過學習，以便充分利用新信息技術的一切能量。

這可被視為贊同技術社會的捍衛論點，它將人類的未來描繪得十分幸福，人人遲早將成為技術客或網客。

然而，人們越來越開始承認發達的西方社會內居主導的信仰和希望對現實無法作一個全面的解釋。這是一個空虛、把握相對化、對進步的希望渺茫的時代，似乎預示著一場達到一個更加美好的社會的不可避免的革命。儘管我們越來越意識到，人類並非萬物與宇宙的中心，我們人類不過是居住在一個被淹沒在“百萬星系中一個周邊小星系微小太陽系”（Morin, Edgar：2003年）星球上的一種動物。星系構成了已知的天地萬物，是宇宙歷史上最近的主人公。

那麼，這與社會，尤其是數字時代的教育有何關係呢？教育目前正面臨一場危機。它是由無法給學校教育以意義、含義與目的而造成的。

此種教學論點將會造就某些“假神”。一進學校，便試圖解釋學校展開的教學大綱與活動。信息技術的神祕化與其經濟實用主義是新自由主義論點的說法。新自由主義論點要求國家最低程度地參與教育問題，要求教育活動更加符合實業及金融市場的需要，損害公眾教育而注重私人教育。

一致的看法是，政治及教育實踐應該改變並適合21世紀的信息社會。但值得一問的是：向何方向改變？欲達何種教育及文化目的？為何種社會、經濟及政治模式服務？

還可以發問的是：數字時代或信息社會具有何種社會及文化現象特徵？甚麼是教育的主要問題？如何使全體公民享有教育及技術？

新信息技術肯定會導致教育的重組，但必須注意，而且要保證新技術對社會與民族的民主化，使所有公民獲得能力，而不是僅僅面向信息社會的某些機構和處於優越地位的技術精英作出實際的貢獻。

造就民主公民，使後代具有民主和多元文化性，並努力創造一個新經濟，這便是在這一新千年中教育重組的主要目標。

如弗雷依雷所言，教育的中心包括識字的能力，還包括了解世界的能力。這樣，各種文化素養不僅包括計算機及通訊文化素養，還包括社會及文化素養的諸多方面，從生態文化素養（包括身體與環境）至經濟及金融和其他許多文化素養。它們應該使學生了解並很好地置身於我們的社會世界。

教育使人獲得一種在一個發展與變化的地球上得以更好生存與興旺的身份與文化的資本，並使人們創造一個更加平等、友愛、寬容、正義，因而更加民主的社會。

多元文化是現代教育行為的另外一個重點。新信息技術在何程度上可以傳播這個教育及公民教育的信息？

在任何一個民族或國家的歷史上，人民與人民之間總要交往，相互影響，無論是通過戰爭，還是通過貿易及遷移活動，甚至通過敵對、模仿，乃至崇洋迷外。

任何一種文化傳統是各種或多或少經過修改的多種影響的揉合。

儘管全世界的文化一體化論者（亦可理解為原教旨主義者）不願承認，的確不存在獨立與純粹的文化。換言之，我們可以何種價值及標準的名義來判斷它的完整性與純潔性？

多元文化社會從來就存在過，現在最難的是“造就”多元文化的人。邊界、國旗、國歌，每人頭腦中的國界概念得到了系統發育的繼承並得到教育政策加強的沉重遺產，這些是多元文化寬容的大敵。

506 一個多元文化社會決定性的問題是尋求認同與政治之間的新銜接。這裡最主要的是民主國家與社會所擁有或欲擁有的形象，尤其是人們如何

看，如何理解，亦即一個國家或類似的社會，或一個國家或具有不同“國籍”或文化的多元共處社會如何享有全部權利實際與切實的平等。多元文化性只有同社會的民主化及其必然的民主成效相聯繫才有意義。（羅世賢：1998年）

卡布拉爾（Francisco Cabral）教授（1995年）指出了多元文化社會形成的5種水準，對此，我們在刊登於《澳門雜誌》（第2系列，第78期，1998年10月）的《澳門：多元文化社會》一文中已有所闡述：

- 權力平等的結構水平，其要求是反對種族歧視；非種族化；超民族化；民主化，人民應該理解為所有居民；逗留權——領土權；橫向化。
- 價值平等的文化水平，即承認所有人有不同行為的平等權力：這便是共處與建設一個多元文化社會的文化水平。
- 價值共性的種族水平，即創造一種可以融合社會聚合及社會團結的需要和具有不同權利的新的政治、民主文化。
- 我們是同一社會的構成部分情感的感情水平，即同其他人的感情，對不同及多樣的認同；如果我們願意的話，可以說是一種具有新內容的新“民主愛國主義”。它可以使一個人更加近似一個反對種族歧視者，而不單單是一個葡萄牙人。
- 形象與外觀的美學水平，即創造一個具有共同未來的理念、形象、夢想與外觀。

一切在於從多元文化教育的角度而展開的教學內容，即通過傳播與深化和以不斷批判的對話來總結所採取的“普世原則”。這些原則是創建人類團結與尊嚴權利的遺產及創造一種邁向接受他人價值平等、共同改造、對話式和創造相互相對關係多樣的文化構造。（Cabral，Francisco：1995年）

因此，教育是民主進步與全球多元文化的中心問題與必要條件。

還有一個問題：新信息技術在何種程度上可以傳播這一教育及公民教育的宗旨，即將全世界的公民改造成多元文化的公民？

顯然，首要的是，在一個國家及國家之間的所有社會團體內，建議、培養和提倡新信息技術的重組。事實上，在有使用新科技者與沒有使用新科技者之間日益增大的區別應該成為教育的知識理論及政治反思的當務之急之一。這項事業需要教育者與希望學生中弱勢群體可以利用新技術的政治家配合，予以積極的參與。這一配合需要教員及其他教育人員同家長及教育監護人協會及其他協會，同官方與非官方的游說團體，以及研究及贊助研究計劃的機構在網絡上溝通。

同時要求教員成為公眾教員，努力創造一種在社會上對民主及公民教育文化負責，有相當的餘地來回答新經濟及文化挑戰的學校。為了戰勝“數字邊界”，要求學校參與社會與教育改革，以便使包括在社會階級、種族團體或那些傳統無法享受主流社會團體的權益的人得益。

必須進行深刻的哲理及教育改造，使新信息技術為多元文化教育及社會變革服務。這一重建過程既應針對教員，又應面對學生。幫助學生們在使用通訊及多媒體手段中，區別好壞、優劣、道德及不道德。另一方面，師生應該學會像鑑定印刷品那樣鑑定新的文化形式。

這一通過新信息技術所進行的工作應該被用來尋找和討論所有存在於我們內心和被認定為民主、自由和平等的政府體系和社會方式中的傾向於不容忍和迫害態度的社會功能失調。可以看到，危害人類罪不僅僅局限於通常被認為是邪惡、專制、法西斯、反民主及其他形容詞的人民與國家。這使我們不禁發問並看到某些使我們的民主大為不安的真實情況與現實。

具有巨大能量的新信息技術可為我們提供幫助，尤其是為歷史、政治學、經濟、社會學等課程提供背景資料，更加吸引人了解政治及社會壓迫的各個方面，並以圖像傳授抵制不容忍、種族、宗教、語言、政治、經濟、性別歧視及其他壓迫方式的最好教育與政治方式。

與公民教育（社會或個人教育，或類似的稱謂）有關的一項課程必須加入所有小、中學教育大綱中。應該運用新的信息技術認真備課。

未來的學校論點取決於我們現在의思想和教學實踐。因此，必須從各個方面，如文化社會學、社會心理學、教育理論、課程理論，尤其是教育技術及其對在一個民主及多元文化社會中教育行為完善的貢獻方面來衡量目前的教育政策。

參考書目

Abdallah-Preteuille, Martine (1999), 《多元文化教育》, 巴黎, 法國大學出版社。

Cabral, Francisco (1995), 《多元文化社會》, 波爾圖, 遷移主教會議出版社。

Castells, Manuel (2000), 《信息時代, 經濟、社會與文化》, 第1卷, 網絡社會, 和平與土地出版社, 聖保羅。

Castells, Manuel (2000), 《信息時代, 經濟、社會與文化》, 第2卷, 認同的力量, 和平和土地, 聖保羅。

Barnatt, Christopher (1997), 《挑戰現實》, 奇切斯特, 約翰威里及子女出版社。

企業總裁科技教育論壇 (CEO Forum on Technology Education), 《數字學習的能量》, 華盛頓, 企業總裁科技教育論壇 (CEO Forum on Technology Education) 出版。

Forquin, Jean-Claude (1996), 《學校與文化》, 布魯塞爾, De Boeck 大學。

Gellner, Ernest (1993), 《民族與民族主義》, 里斯本, Gradiva 出版社。

Kellner, Douglas (2000), 《全球化和社會新運動》, 批評理論與教育學課程, 載《全球化與教育》, 紐約, Routledge 出版社。

Kerckhove, Derrick (1997), 《文化之皮膚》, 里斯本, 滴漏出版社。

Labat, C., Worms, G. (1994), 《開放文化, 多元文化社會》, 巴黎, L' Harmattan 出版社。

Lévy, Pierre (1998), 《何謂虛擬?》, 巴黎, La Découverte & Syros 出版社。

Lynch, James (1983), 《多元文化課程》, 倫敦, Battsbord 學院。

MacLaren, Peter 等 (1995), 《重新考慮媒介的文化素養》, 表演的評論教育學, 紐約, Peter Lang 出版社。

May Stephen (1994), 《進行多元文化教育工作》, 克利維頓, 多元文化問題出版社。

Morin, Edgar (2003), 《V 方法。人類的人文性。人類的認同》, 門馬爾廷斯, 歐美出版社。

Moreira, M. Area, (主編), (2001), 《在信息社會從事教育》, 畢爾巴鄂, Desclée de Brouwer 出版社。

Ouane, Adama (1996), 《關於教育的多語文化》, 巴黎, L' Harmattan 出版社。

Rist, Gilbert (主編) (1997), 《反主流社會的世界化》, 巴黎, 法國大學出版社。

羅世賢 (1998), 《澳門: 多元文化社會》, 載《澳門雜誌》第2系列, 第78期, 1998年10月。

Ruano-Borbalan (主編) (1998), 《認同》, 歐塞爾, 人文科學出版社。

Stavenhagen, Rudolfo (1990), 《種族問題》, 東京, 聯合國大學出版社。

Touraine, Alain (1998), 《異同》, 里斯本, Piaget 學院。

集體著作 (1998), 《對人類的權力》, 巴黎, Autrement 出版社。

Vermes G.; Tanon, F.(1993), 《個人及其文化》, 巴黎, L' Harmattan 出版社。